

邓小平对改革动力论的重要贡献

杨军 易善宇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的实践进程中, 在理论上对改革进行了持续探索。邓小平破除了关于改革的认识误区, 阐明改革与革命一样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动能; 通过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 阐明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通过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标准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揭示改革这一动力发挥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关于改革动力问题的探索,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

[关键词] 邓小平 改革动力论 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4)08-0027-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8.003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一“觉醒”中包含一系列认识的跃升、理论的创新。其中,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探索和科学论证, 无疑是关键一环, 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从理论上校正了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误解, 阐明了改革与革命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并且规定改革这一动力发生作用的方向, 从而确立起科学的改革动力论。

一、破除对改革的误解, 阐明改革的战略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虽然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但是社会思想领域关于社会发展

动力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多误区。最为突出的是: 其一, 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但忽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前提和指向。应该说,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时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论断, 主要指社会革命在促使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这种根本性变革时是强大的动力。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已经为人类历史, 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长期将这一论断简单套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上, 这无疑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设定, 而且, 在实践中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其二, 忽视恩格斯、列宁关于改革的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阐明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但是关于这一问题有一些初步的论述。恩格斯晚年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 列宁认为, 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是

[作者简介] 杨军,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武汉大学)”(项目批准号: 21SZJS42010486)。

不同的。革命是一种能够最基本最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改良则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2]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要从“革命”转向“和平改良”,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主要不是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政治革命,而是通过逐渐的、审慎的方法改造旧的社会生活。列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提出了与新经济政策配套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构想。这些思想包含着改革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意蕴,但是在我国一度被忽视。基于上述两个误区,在我国社会思想领域存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评说革命与改革,对革命和改革(改良)进行简单划分的情况:视革命为进步的、彻底的,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视改革(改良)是保守的、妥协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人们在面对改革时产生质疑,而且也压制了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邓小平审视思想领域的诸多误区,分析了其产生原因,着力从多个方面进行回应、纠正。

首先,把思想解放作为科学认识改革的先决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党内外普遍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倾向,邓小平推动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阐明“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邓小平强调,改革不能“靠本本”,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求全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敢于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否则“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

其次,从革命和改革的共性说明改革的价值。邓小平洞察思想领域在革命与改革上的误区,超越抽象的概念讨论,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察革命与改

革的共性,以“发展生产力”为中介来矫正对改革的认识。邓小平强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认为革命和改革的共性在于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5]“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6]当代中国的改革虽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与“革命”路径不同,但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其实践价值在于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所以,相较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社会主义改革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再次,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凸显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邓小平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反思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阐明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邓小平认为,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从现实来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存在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合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系列问题,如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管理水平低下,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对外相对封闭,等等。这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实现。邓小平站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审视改革的实践及其成果,确认改革重大抉择的正确性。1984年,邓小平总结创办深圳特区的经验,认为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不改革“就只能是死路一条”。^[10]由此,邓小平将对改革必要性、紧迫性的判断奠立在客观事实之上。

邓小平的上述论述,引导人们逐步破除对改革的误解和疑虑,推动全社会形成宝贵的改革共识,

也赋予中国共产党探索、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勇气。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用鲜活的事实确证了邓小平的思想,也教育了人民,促使人们对改革的态度由怀疑转变为理解、认同和支持。1987年,邓小平坦言:“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11]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12]“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3]等等,正是对邓小平上述论述的继承和阐发。

二、揭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并没有完成这一理论任务。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科学运用辩证法,审视、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我国初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经验,在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4]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基本矛盾”;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15]在社会主义里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6]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民主的办法解决。毛泽东根据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中国具体表现的分析,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坚信“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17]着眼于“走自己的路”,提出了一系列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的设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始终,但为科学认识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提供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贡献,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18]同时,邓小平从毛泽东的论述中,看到有待完善、发展的地方,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9]因为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是搞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本动力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如何发挥作用等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本质和现象、抽象和具体、普遍和特殊的关系,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是通过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来表现的,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历史活动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解决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所以,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还必须深入、具体地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关系、解决基本矛盾的具体途径等。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选择正确的实践方式,推动基本矛盾所具有的动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邓小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矛盾运动转化社会发展动力的实现方式和途径等问题给予了科学阐释。

其一,阐明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呈现的问题,党的八大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作出回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

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0]这一认识将社会基本矛盾与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联系起来，但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未得到坚持。邓小平反思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认识曲折，推动全党实事求是地认识国情、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三大确认我国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1]由此，我们党恢复了党的八大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方向，形成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揭明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这一认识不同于毛泽东侧重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认识我国社会矛盾的视角，一是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建立在对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上，二是把关注点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方面，从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上来分析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上来评价现有的上层建筑，说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仅仅要关注生产资料公有的程度、人们思想觉悟的高度，而更应关注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的适应程度。

其二，阐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把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统一起来思考。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性质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一致的，都是非对抗性的，因而不需要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不能用颠覆社会既有制度体系的方式来解决；二是在价值取向上，社会主义社会解决基本矛盾与解决主要矛盾是一致的，都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邓小平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2]三是在具体方式上，解决基本矛盾和解决主要矛盾是一致的。既然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那么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23]相应地就要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方面。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在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意味着社会基本矛盾通过社会主要矛盾得到呈现，也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得到调适。改革既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从根本上看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

邓小平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基础上，阐释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层面，确证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为揭示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与作用提供了新的认识成果。这一认识成果丰富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引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科学认识改革，即不能把改革当作可有可无、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的一种政策，而要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改革，理解改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主动、自觉地推动改革。正是坚持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24]

三、阐明改革发挥动力作用具有方向性

邓小平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洞察到“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5]邓小平将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融于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中发生颠覆性错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后，邓小平对坚持、维护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思想和举措日益系统。

其一，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以提供根本保证。在改革巨轮启动之初，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他认为，四项

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集中体现了我国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方面。因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6]“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27]邓小平还把四项基本原则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如果动摇其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8]晚年邓小平在反思中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29]在邓小平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为了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落实到党的实际工作中，邓小平推动党中央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不可动摇的基本点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宪法的序言，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

其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排除干扰。在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对改革目的、性质的不同解读，思想领域的纷争从未停止，这对改革实践产生了干扰。由于改革的方向问题关乎改革的成败，邓小平高度重视思想领域的不同观点，并积极回应。

关于改革的目的，邓小平坚持把“物”与“人”结合起来讨论。邓小平阐明，一方面“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30]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从价值目标来看，改革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因为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将大大调动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更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实现了这种统一，就能“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1]

关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针对那种虽然主张改革，但将“改革的旗帜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试图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西化道路的错误观点，反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

善”。^[32]邓小平多次结合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强调改革的性质，指出：“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33]“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34]邓小平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由于改革开放是长期的，西方利用改革开放之机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诱导中国在改革中“改向”也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5]在改革过程中排除错误思想、错误思潮的干扰也将是长期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呼吁全党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36]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防微杜渐。邓小平对改革中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科学研判，对各种错误思想、思潮的矫正、批判，引领了党和人民坚持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共识，保证我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大曲折的情况下顶住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

其三，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引导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而诞生的。它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实现了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邓小平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政治立场，始终依循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结合的思路来设置评判改革的标准。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37]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38]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生产力标准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指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39]然而，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了将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唯一化的倾向，出现了只重短期的、局部的经济效益，忽视长远利益、社会效益、全局利益的现象，出现了将等价交换原则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现象，还出现了因苏东剧变和改革中一些地方、部门的失

误而质疑改革的声音。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0]“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生产力标准为根本,把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从目标的角度为改革开放各项实际工作提供价值导向,宣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改革探索中不可逾越的底线;要求在改革探索中要处理好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明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利用资本、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等手段,最终要服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邓小平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和坚持,无疑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告诫,即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把握、运用改革这一动力。这是因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历史规律存在于人的活动中。虽然历史主体不可能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不是脱离主体、脱离价值追求的纯粹的物质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改革无论是在过程上还是在结果上,既要合乎规律又要合乎改革主体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坚定开展改革,也要善于开展改革,要在改革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改革中的重大关系和风险挑战,特别是科学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具体体现到改革政策设计、改革成果分配、改革措施实施上,同时要防止西方通过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对改革的破坏和误导。苏东剧变用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证明“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41]当代中国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42]中国决不能在改革中犯颠覆性的错误。

总之,邓小平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进

行了探索,第一次科学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使列宁、毛泽东探索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得到清晰明确、理论化的表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丰富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科学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南。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 [2] 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58.
- [3][4][5][6][7][8][10][25][30][31][33][34][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372,370,370,113,139,370,138,134,256,142,195,46.
- [9][18][19][22][26][27][28][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181-182,182,182,164,278,173,314.
- [11][29][35][39][40]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05,1363,965,1213,1353.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30.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
-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3.
- [15][16][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213,275.
- [20][21][23][32][38]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90,476,658,761,347.
- [24][41]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75,53.
- [4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6.